



现代媒介环境发展 与城市文化演变

◎ 潇潇 著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WWW.NEUP.COM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现代媒介环境发展 与城市文化演变

潇潇 著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WWW.NNUP.COM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代媒介环境发展与城市文化演变 / 潇潇著. — 长春: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5
ISBN 978-7-5681-3105-6

I. ①现… II. ①潇… III. ①传播媒介—发展—
研究—广州 ②城市文化—文化发展—研究—广州
IV. ①G219.276.51 ②G127.65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21256号

- | | |
|------------------------------------|-------------------------------------|
| <input type="checkbox"/> 责任编辑: 卢永康 | <input type="checkbox"/> 封面设计: 优盛文化 |
| <input type="checkbox"/> 责任校对: 赵忠玲 | <input type="checkbox"/> 责任印制: 张允豪 |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春市净月经济开发区金宝街118号(邮政编码: 130117)
销售热线: 0431-84568036
传真: 0431-84568036
网址: <http://www.nenup.com>
电子邮件: sdcbs@mail.jl.cn
河北优盛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装帧排版
三河市同力彩印有限公司
2017年10月第1版 2017年10月第1次印刷
幅画尺寸: 170mm×240mm 印张: 12.75 字数: 208千

定价: 41.00元



前言

PREFACE

媒介环境是大众传播理论中的一个重要理论，由媒介内容环境和媒介工具环境组成的媒介环境在信息社会中与现代人的生活有着密切的联系。纵观传播媒介的发展过程，我们不难发现，传播媒介是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与改进的。每一种新媒介的诞生都曾经给人类带来了极大地冲击，深深影响着人们的生活。

从微观视角出发，城市是媒介的环境——这里的“媒介”是指媒介组织，或称媒体单位，其生存和发展往往仰赖于城市人文空间，因此可以说城市为媒介组织提供了最基本的外部环境。从中观视角出发，城市是媒介的群落——这里的“媒介”是指具有显著区域特色的各种城市媒介，不同城市的媒介群落犹如自然界的不同生物圈，都是更高层级生态系统的子系统。从宏观视角出发，城市是媒介的生态位——这里的“媒介”是指广义的传播载体，城市只有在立足自身资源和发挥比较优势的基础上合理定位，才能避免因生态位过度重叠而导致的恶性竞争，从而寻求城市自身的社会文化发展和人类传播事业地进步。

对于更广泛意义上的媒介组织而言，城市是媒介环境的基本域和核心域。工业革命以来，城市逐渐具备了形成大众媒介市场所需要的信息源、广告商、受众、资本市场和人才市场等各种要素。无论是从纵向的历史长流，还是从横向的世界范围来看，媒介组织总是“择城而栖”，在城市的边界内，媒介组织和传媒机构建立起来，有的还发展成为规模庞大的传媒集团，一座座传媒大厦拔地而起成为城市的地标性建筑，媒介人才不断聚集。伴随着城市化的脚步，媒介组织在城市中的生存发展环境日益完善，媒介环境不仅是城市精神文明生产的重要载体，而且还成了城市物质文明生产的强劲推动者。

本书在介绍媒介环境理论的缘起和媒介环境学的深刻性与片面性研究的基础上，概要介绍了现代媒介环境与城市文化关系解析以及媒介的结构性矛盾与城市文化建设的研究，并对现代媒介环境视角下的城乡关系、全球化视角下的城市文化进行了简要地叙述。然后，具体分析了媒介环境理论下的我国城市文化的变迁，城市文化建构的媒介环境发展策略，使读者可以清晰地了解和掌握现代媒介环境发展与城市文化演变的相关内容。对在本书的编写中未列出的引用文献和论著，我们深表歉意，并同样表示感谢。由于时间的仓促，编者水平有限，难免存在不足之处，在本书出版之际，我们真诚地希望读者对本书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目录
CONTENTS

- 第一章 媒介环境理论的缘起 / 001
 - 第一节 媒介环境理论的由来 / 001
 - 第二节 媒介环境理论的建构 / 008
 - 第三节 媒介环境理论的传承 / 010
 - 第四节 媒介环境理论的发展 / 021
- 第二章 媒介环境学的深刻性与片面性研究 / 027
 - 第一节 对媒介环境学的批判研究 / 027
 - 第二节 技术决定论的发展探析 / 031
 - 第三节 媒介环境学与技术决定论关系研究 / 036
- 第三章 现代媒介环境与城市文化关系解析 / 041
 - 第一节 媒介介入的城市文化生产要素分析 / 041
 - 第二节 媒介影响的城市文化生产过程探析 / 043
 - 第三节 媒介与城市文化的共生关系研究 / 046
- 第四章 媒介的结构性矛盾与城市文化建设的研究 / 051
 - 第一节 媒介发展中的城市罪恶与认同危机 / 051
 - 第二节 割裂的媒体公共性与城市形象的分化 / 056
 - 第三节 地域文化的崛起与认同性的变迁 / 061
- 第五章 现代媒介环境视角下的城乡关系 / 067
 - 第一节 现代化进程中的城市与乡村 / 067
 - 第二节 乡村视角的城市变迁研究 / 070

第三节	媒介发展中的城乡差异化研究 /	076
第四节	文化寻根与影像怀旧的分析 /	085
● 第六章	全球化视角下的城市文化 /	097
第一节	全球化、地方化与民族化的关系研究 /	097
第二节	现代城市化进程中媒介的扩展探析 /	102
第三节	全球化视角下的文化传统与城市怀旧 /	109
● 第七章	媒介环境理论下的我国城市文化的变迁 /	123
第一节	革命时代下的媒介环境与城市文化 /	125
第二节	改革开放背景下的媒介环境与城市 /	130
第三节	市场经济语境下的媒介环境与城市 /	134
● 第八章	我国广州的文化记忆与城市想象 /	145
第一节	广州城市文化的溯源研究 /	145
第二节	现代媒介语境下的新广州分析 /	150
第三节	广州文化的特殊地位及其建构悖论 /	157
第四节	传媒影响下的他者想象与地域主义分析 /	161
● 第九章	建构和谐的媒介环境 /	165
第一节	平衡的悖论研究 /	165
第二节	媒介环境理论中的难题分析 /	174
第三节	媒介环境建构的内在道德探析 /	179
● 第十章	城市文化建构的媒介环境发展策略 /	185
第一节	城市形象的政治经济学研究 /	185
第二节	城市品牌的传媒策略发展分析 /	188
第三节	城市文化传播与城市形象片的推广 /	192
●	参考文献 /	197

第一章 媒介环境理论的缘起

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北美媒介环境理论，其英文表述为“Media ecology”。它与社会文化发展、生态危机和科技危机的反思有着直接的联系，并且呈现着媒介发展的真实问题，具有独特的理论内涵。

第一节 媒介环境理论的由来

就社会起源而言，人类对环境的想象最早是作为一种生存本领存在的。在早期的医疗仪式中，人们通过唱歌、念咒、跳舞来治病驱灾。他们认为疾病和灾祸是由于自然环境失去平衡与和谐的状态而导致的。从词源来看，Eco-最初源于希腊语的 oikos，指自然，也就是被爱德华·侯格兰（Edward Hoagland）称为“我们最野性的家园”的地方。在这个意义上，环境是有机的，它关注如何使思想和社会能够像森林生态系统一样获得平衡。波兹曼指出，来源于希腊词汇的“ecology”并不是将我们的注意力导向自然环境，其最初含义是“家园”和“家庭”（household）。

现代环境问题是工业社会的产物。随着蒸汽机的发明以及工厂系统的建立，人口大量从乡村涌向都市，人们全力以赴地促进生产以增加财富，同时也经历了环境危机。在人们越来越深重的忧虑中，德国动物学家海克尔（Erns Haeckel）在1866年首次提出“生态学”一词，思考有机体如何保持形成数量和分配的复杂社会盟约。他强调各种因素的互动如何产生一种平衡和健康的环境。瑞典林奈学派的科学家还提出了“生物链”（Chain of Being）这一术语，指出“如果这条自然链中的一个环节断裂，都将导致整体的混乱无序”。19世纪后半期在英美兴起的自然史散文写作同样呈现出寻找已经失落的乡村野趣与温



馨家园的主题，提出了对于有机环境的怀念。

20 世纪初的大萧条和两次世界大战把环境的内涵强有力地推向大众叙事。适者生存的自然选择此时已经衍化为愈演愈烈的军备竞赛和环境污染，带来了各种各样的疾病以及社会和心理的失调。“两个半球的国家都卷进了一场任何和平条约都无法解决的世界性冲突”，人们不得不恢复对生命价值和人类命运的思考以及对平衡和谐环境的关注。在这种思想背景下，生态学的精神与想象很自然地移入对西方人的现代生活产生巨大影响的技术领域，思考技术作为人类生存环境的内在问题，形成了媒介环境学的直接思想来源。

西方世界从 17、18 世纪开始进入技术高速发展时期，科学技术的发展创造了巨大的生产力，不断扩大的工业化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与生活内容。人们因崇尚理性而崇尚科学技术，反过来又因崇尚科学技术而加固了理性统治人的机制。表面上看是人控制着技术，但实际上是技术更多地控制着人，使人丧失了内在的灵性，而且随着技术的发展与工业制度的建立，人被工业文明束缚在机器系统上，失去了生存的和谐。

这时，西方人对技术的态度是矛盾的，在对技术产生某种认同的同时，也把技术看成是异己之物。在 1811 年至 1816 年间由英国人内德·勒德（Ned Ludd）发起的破坏机器运动，就是后一种态度的表现。那些被发动起来的工人有一个很直观的看法，认为机器应该为他们的失业和贫穷负责。这看上去似乎幼稚、简单，而实际上是在一定程度上感悟到了技术在充当创造财富的手段时剥夺人的存在的实质问题。

这种对技术剥夺人的存在的感悟并非偶然，而有着某种历史传承性。它在苏格拉底那里曾经表现为对文字的抱怨，即文字削弱人的记忆力，缺乏互动，任意撒播，脱离说话人和听话人的灵魂；它也曾经表现为卢梭式的忧虑，认为科学技术产生闲逸，而闲逸又引起奢侈，并进而导致勇敢、尚武与德行的丧失。工业革命后，随着电气、电报、电话、照相术、电影等的发明，技术日益发展为包括物质装置、技艺与知识在内的改造与控制自然的操作体系。“人类生活的两个世界——他所继承的生物圈和他所创造的技术圈业已失去平衡，正处于深刻的矛盾中”，人们在技术主义的道路上——一路狂奔、一路高歌，同时由于技术加倍地剥夺着人的存在，人对技术的理想化想象背后不免继续掺杂着恶魔化的忧虑。弗洛伊德所分析的一种表达很能说明这种精神状况：“假如那儿没有铁路，我的孩子就不会离开家乡，我也就不会用电话来倾听他的声音；假如人们不知道用船可以穿越海洋，我的朋友就不会踏上他的航程，我也就不会等着电报来缓解对他的焦虑”。这样的忧虑在 20 世纪人文主义者那里散发着某种浪漫主义的气息，即试图拯救被工业文明所淹没的人的灵性，拯救人被技术理性思

想浸渍的思维方式。在他们看来，技术并不是中性的，并非只是一种达到目的的手段或工具体系，而完全把它所带来的社会问题归因于人对技术的滥用或对技术目的的不当规定；真实的情形是，技术已构成它在其中发展并得以体制化的社会秩序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技术本身同它的用处已不可能完全区分开来。

当时，一批技术哲学论者从人性角度审视技术，他们关心城市生活的和谐、荒野的保护和对生命有机体的感受，以生命的名义展开对技术的猛烈批评，芒福德（Lewis Mumford）在1934年出版的《技术与文明》，正是这方面的代表作。他把技术发展的历史还原到人类的早期生活，认为原始技术是生活指向的，而不是狭隘的劳动指向的，更不是生产指向的或权力指向的，工具与武器只是人的生命技术，即人的生活的总体装备的特定组成部分。只是在大约五千年前，一种通过日常活动的系统组织来致力于权力与财富增加的单一技术（monotechnics）开始出现，直至发展为以机器为中心的单一技术，其主要标志就是一种复杂的、高度权力化的“王者机器”（megam-achine）的建立。这种单一技术带来了新的生活模式，既把人从奴隶状态甚至劳动中解放出来，又使劳动进入机械化和自动化过程，与生活的其他部分分离，成为单一的重复性劳动，进而形成与之相伴随的心理强制，使劳动者陷于恶魔式的无意识之中。在这里，芒福德向人们揭示出现代单一技术脱离生命技术后所构筑的复杂环境及其对人的生存与发展所带来的深刻影响，认为人们要在危机四伏的技术文明中生存下去，必须回归生命技术，有意识地培养被单一技术压抑的有机环境和人性。虽然他没有具体论及媒介，但这种思维方式直接成了媒介环境理论的思想来源。麦克卢汉后来从媒介演化的角度去概括人类的历史，提出“部落化—非部落化—重新部落化”的公式，其背后所隐含的便是“有机化—机械化—重新有机化”的进化路径，亦即芒福德的“生命技术—单一技术—生命技术”的历史想象。

对“媒介作为环境的研究”具有直接启发意义的是芒福德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技术即容器”的观点。在他看来，与工具和武器不同，“容器技术”是经常被忽视的一种技术形式。“对于妇女而言，柔软的内在器官是她生命的中心，不管是幼儿还是成人，她的手和脚的运动能力都要比屈伸和拥抱的能力差。在母系氏族社会，新石器时代已经是一个拥有‘容器’工具的显赫时代：除了沟渠、村庄这些巨大的‘容器’以外，这个时代还有石器、陶器、花瓶、广口瓶、缸、蓄水池、箱柜、谷仓、房子等等这样一些‘容器’。但是这一时代所具有的独特性和显著性却被现代那些过分强调机械意义上的科技进步的学者们忽视了。”在他那里，工具、武器和机器都是男性文化的符号，“容器”则显示出女性文化符号的特征，有机体和生物学意义上的繁殖则是女性文化的代表。



此外，与媒介延伸论的观点相比，“技术即容器”的观点更加接近媒介环境的观念或技术系统的观念。

这一理论拓展了一种对技术、文化和城市的整体性视角，它能让我们联想到，文字也是一种“容器”技术，它不仅能够贮存信息，还因为早期保留和记录谷物的功能，文字也能够贮存物质，我们生活在文字所构造的环境之中。更重要的是它不是仅从内部的结构来给机器下定义，而是从它所产生的外部影响出发来思考这一问题，开启了媒介环境的论题。

与芒福德关注技术本身形成互补的是，弥漫于欧洲思想界的关于技术的人文主义反思从不同方面揭示了面对技术异化所带来的文化个性和主体性的丧失，奠定了媒介环境学的文化批判倾向。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1936年发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品》一文，认为复制技术一方面对原作的唯一性和笼罩于其上的“韵味”构成了挑战，使其获得新的意义并被一个更广泛的人群所拥有；另一方面又带来了沉重的、压抑性的后果，它可以强化专制政权，并且由于复制技术的广泛传播，仿佛经常既是革命性的，又容易被主流意识形态所扭曲。胡塞尔在《欧洲科学的危机和超验现象学》中指出，随着现代技术与科学的发展，在人的直觉的生活世界与由科学技术所建构的世界观之间出现了二元分裂。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在1944年出版的《启蒙辩证法》中指出，启蒙在今天已成为技术的统治，而启蒙作为技术的统治，又加速了统治的技术发展；各种文化形式由于有先进的技术作为手段，能更好地操纵、控制群众的心理结构，而且由于技术理性的渗透，在大众文化中推行标准化、一律化，使大众丧失了批判现实的能力。

到1964年，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中进一步指出，在当代工业社会，人之所以成为单向度的人，其根源在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自动化的实现，在于现代技术已经取代传统的政治恐怖手段而成为一种新的控制形式，现在，技术理性已充满政治内容，技术的逻辑已成为统治的逻辑。在把技术当成新的统治或工具看待的过程中，霍克海默和马尔库塞都认识到，技术以更强大的无形的力量支配着人的思想，技术合理性成为新意识形态的核心内容。顺着这一思路，哈贝马斯撰写了《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一文（收入1968年出版的《走向一个合理的社会》），揭示出科技作为新意识形态的三大特点，即更具操纵性、较少意识形态性和更具辩护性。这些思想与现实的人们对技术越来越成为异己力量的恐惧交相呼应。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以后，西方人进一步怀疑科学在道德上的合法性，怀疑技术发展的混乱程度，甚至怀疑技术是物质富裕与进步的基础，以及人类理性取代宗教信仰的文明梦想，并产生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紧迫感。对文明成果中存在的阴暗面的怀疑不仅存在于奥本海默等科学家中间，

也引起了人文社科学者的共鸣。英国作家奥尔德斯·赫胥黎（Aldous Leonard Huxley）和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分别在各自的小说《美丽新世界》和《一九八四年》中描写了充斥着庸俗文化、无规则游戏和工业技术的未来世界以及独裁统治下的恐怖情景。法国生态学者埃吕尔（Jacques Ellul）在《技术社会》（1964）一书中的表达更悲观，认为技术作为一种自主性的力量，现在已经渗透到人类思维和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以至于人类已经失去了他对自己命运的控制能力。哲学家弗洛姆（E. Fromm）进一步呼应芒福德的思想，在1968年出版《希望的革命：走向人道化的技术》一书中，他试图使人们明白，在现时代，社会已成了一个巨大的机器，而人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部件。在他看来，现存的技术系统之所以具有一个非人道化的前景，并向一个没有人性的机械化新社会演进，是因为它为两个坏的原则所指导，即“凡技术上能够做的事都应该做”“最大效率与产出原则”，这两个原则否认了人文主义价值，使人更容易为官僚体制所管理。

自工业革命以来，西方社会大量流行技术中心论，认为技术不会产生什么特殊的伦理与政治问题，因为技术仅仅是实现价值的手段，而价值则另有其他基础。在上述人文主义的反思中，技术中心论失去了合理性，转而形成了这样一种共识：技术不只是一种达到目的的手段或工具体系，它是负载价值的，因而具有丰富的伦理与政治含义。

上述问题的讨论核心焦点是：人如何在不断地创造异己的环境，如何离最初基于肢体的接触、面对面地交流、群体乐趣分享的有机环境越来越远。

媒介环境理论正是顺着这一思路，假定传播媒介在将数据或信息从一个地方传递到另一地方时并不是中性、透明或无价值的渠道。相反，媒介的内在物质结构（physical structures）和符号结构（symbolic structures）在塑造什么信息被编码、传输和怎样被编码、传输以及怎么被解码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媒介的符号形态限定了该媒介所能代表信息的代码特征。

当技术作为一种环境足以让人震撼与恐惧的时候，技术生态就成了现代人走出困境的合理想象。而对于媒介研究来说，媒介环境学则代表一种理论思维的转向，摆脱技术理性指导下的媒介功能、媒介影响力与媒介市场研究，顺着技术理性批判的思路，把和谐与平衡作为目标，把“媒介和人类之间的互动给予文化以特性的方式”作为媒介环境研究的焦点。波兹曼因而指出：“媒介环境学研究传播媒介如何影响人的感知、感情、认识和价值，研究我们和媒介的互动如何促进或阻碍我们生存的机会……研究环境的结构、内容以及环境对人的影响。”

“媒介环境”的概念由麦马歇尔·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最早提出出来是很顺理成章的事情。1967年，他在与人合著的《媒介即是讯息：效果一览》

一书中提出“media ecology”的概念，以环境作为特定的比喻，来帮助我们理解传播技术和媒介对文化在深度和广度方面所起的生态式的影响。1977年，麦克卢汉指出所谓媒介环境“意味着让不同的媒介能够共存共生，而不是彼此消亡”。他偏爱感官平衡，认为一种文化需要限制某种单一媒介的使用，从而促进媒介环境的平衡。在《理解媒介》（1964）一书中，他认为媒介能深入到人的潜意识，并且在不被察觉和反抗的情况下改变他们的感知平衡。这在思想理论上讲，与芒福德对“单一技术”的批判和对“生命技术”的建构是一致的，而在理论上又直接吸收了英尼斯（Harold Innis）关于媒介时间和空间偏向的观点。英尼斯被麦克卢汉称为最早研究传播技术对人类造成影响的人。早期作为经济学家，英尼斯曾经关注过纸浆和造纸工业的经济学问题，印刷技术的优势才使得现代出版业对纸张的无限吞噬成为可能。英尼斯看到的是，自己家乡的森林被转化为纽约地铁上的瞬间阅读。和19世纪的梭罗相似，他回想起自己成长的那个小镇，那里的交流除了个人之外，有一种沉思冥想的从容氛围，他很快得出结论：“现代性的大众媒介根本不给现代人留出时间去思考。即时消息掠夺了人们回首历史的感悟，也掠夺了人们展望未来的力量。这就是现代大众媒介的偏向。技术本身促成了这种思维状态”。显然，他承续了芝加哥学派的观点，即虽然大众媒介使得公众得以产生，但它们又威胁着公共生活。与此同时，面对他所经历的战争的残酷，他感受到，所谓的西方文明就是咄咄逼人的扩张性文明。在他看来，西方文明的危机是与媒介的非人性化的发展相联系的，原因在于媒介在整个历史中塑造着社会，传播媒介的性质往往在文明中产生一种偏向，研究媒介与文明的关系更能使我们清楚地看到西方文明的偏向。于是，他通过《帝国与传播》（1950）和《传播的偏向》（1951）两本著作，以西方文明史为背景，探讨了传播媒介内在的时空偏向对于文化的影响，将现代西方史的特征概括为一个建立在印刷基础上的传播偏向和知识垄断的历史。根据尼斯特洛姆的总结，“媒介偏向”理论主要包括以下假设：

- 由于不同的符号形态（symbolic forms）编译出不同的信息，而不同的媒介具有不同的符号形态，所以它们便具有不同的理性或知识（intellectual）和感知的（emotional）偏向；
- 由于不同的物质形态（physical forms）编译、存储并传输不同的信息，所以不同的媒介便具有不同的时间、空间和感知的偏向；
- 由于不同的媒介具有不同的获得性（accessibility），所以它们便具有不同的政治偏向；
- 由于不同的媒介具有不同的参与条件，所以它们具有不同的社会偏向；
- 由于不同的媒介在组织时间和空间上方式不同，所以它们具有不同哲学

思辨上的偏向；

- 由于不同的媒介具有不同的物质和符号形态，所以它们也具有不同的内容偏向；
- 由于不同的媒介在物质和符号形态以及随之而来的理性或知识、感性、时间、空间、政治、社会、哲学思辨和内容偏向上的种种不同，所以不同的媒介具有不同的认知论（epistemology）的偏向。

这种媒介偏向理论的背后所隐含的是对西方文化发展偏向的关注，即随着口语和手稿传统的消逝，人们不再关心社区、伦理、形而上学，而且这些观念都被维持空间偏向的印刷和电子媒介所取代。英尼斯除了延伸技术生态思维之外，还扩展了文化生态思维。他为传播与文化的研究提供了三个观察的指向：第一，媒介的物质形式（例如轻质及可携带的纸张）和符号形式（例如演讲和象形文字）从不同的方面聚焦在社会经济和政治力量；第二，传播媒介通过影响人类交往的范围和比例而改变文化概念呈现的真实和社会政治的形式；第三，不同的媒介提供了不同的文化思想体系和认知偏向。这种从媒介角度呈现的文化生态思维承认社会中还存在着以媒介为代表的技术力量、文化力量、经济力量和政治力量等多种力量，它们共同构成了传播领域的生物多样性；这些多样性的结构构成复杂的人际互动传播系统，其内在的符号结构能够并确实从总体上定义或决定的不仅仅是信息的产生，还有该环境中人们的行为。这种文化生态思维的价值便是在互动中追求共栖的整体观念，以达到平衡协调的生存目标。

作为媒介偏向理论的逻辑延伸，麦克卢汉在《理解媒介》中表达了这样的见解：媒介传情达意的特定方式能改变人的感官生活——能改变人的所见、所听、所触、所尝和所嗅，因而能改变人的所知。他所提出的“媒介即讯息”的论断之所以具有媒介环境学的意义，原因在于他所指的媒介包括任何可以传情达意的器物，每一种媒介都是人体的延伸，每一种延伸都会使人的五种感官的均衡状态产生变动，结果产生一个新的环境。这就发挥了英尼斯关于时空偏向性的思想，不同之处在于他进而把焦点从人体外在的时空转向了人的感官知觉。

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作为加拿大多伦多学派早期代表人物，英尼斯和麦克卢汉又被看作是媒介环境学的奠基人物。沿着这一学派的足迹走下来的学者包括艾里克·哈弗洛克、埃德蒙德·卡彭特以及作为第三代旗手的保罗·莱文森等人。而媒介环境研究的另一学派——纽约学派，并不像多伦多学派那样所指的是一所单独的学校，而实际上指的是纽约这个城市中的媒介环境学者群体。刘易斯·芒福德被视为纽约学派最早的代表人物，纽约学派早期的成员还包括纽约大学的尼尔·波兹曼、特伦斯·莫兰和尼斯特洛姆，哥伦比亚大学的路易斯·福斯戴尔，福德哈姆大学社会研究学院的约翰·库克，皇后学院的佳理·甘



蓬特、查理斯·魏恩加德纳和曼哈顿的托尼·施瓦茨等。他们虽然学术观点各异，但都有一个共同的兴趣点，即关注媒介对人类的影响，认为媒介的影响超乎常人的意识和想象。

第二节 媒介环境理论的建构

纽约学派的波兹曼是媒介环境学真正的开山之父。他在读研究生的时候，就遇到了当时还不太出名的英文教授麦克卢汉。1968年波兹曼在“全美英语教师委员会”年会的演讲中首次提出“媒介作为环境的研究”。其含义在于，将传播媒介本身视为一种环境结构，即由一套专门的代码和语法系统组建的符号环境。人们掌握媒介之时，也就意味着适应了媒介本身这一符号环境。从微观层面理解，当我们“使用”媒介，从媒介的内在符号世界中思考、感知、谈论或表现身边世界时，我们就不再站在传播媒介之外。相反，我们处于传播媒介符号结构之中。所谓符号环境，其本质特征在于两种以上或多套专门的代码和语法的并存，即多媒介的符号环境。我们在这个层面所关注的是，媒介共存的动态影响以及它们的互动如何产生或组成一种合成的符号环境。

后来，他再次使用生物学的比喻，界定技术、媒介和社会文化之间的关系。

“从你首次知晓皮氏培养皿（petri dish）时起，你会记得‘被定义为文化繁衍的物质的某种媒介’”。如果你用“技术”（technology）来替换“物质”（substance），那么这个定义便成为媒介环境学的基本原理：技术是文化繁衍的媒介；也就是说，它赋予文化、政治、社会组织和思维方式以形式。

至此，技术、媒介和社会文化之间的关系已经被清楚地界定。波兹曼提醒人们注意人类生存在两个不同的环境里，有山川树木的自然环境以及由语言、技术和其他符号组成的媒介环境，后者塑造了人本身。

波兹曼接受麦克卢汉的建议，1971年在纽约大学首创“媒介环境学”专业和博士点，成为该学科的领军人物。他从消极的意义上继承了“媒介决定论”，对电视等大众传播媒介的负面影响忧心忡忡，并向悲观的方向偏离，成为“媒介悲观主义”的代表人物。他的几本著作对电视等大众媒介提出严厉的控诉，如，《技术垄断》（1978）、《童年的消逝》（1982）、《娱乐至死》（1985）。

这时的媒介环境学基于三个基本假设：第一，人类的经验由使机体可触的生物结构和技术，以及代表着经验的符号系统共同塑造；第二，无论生物结构、工业技术还是符号系统都不是信息世界的中立传播者，它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权力，以限制和组织人们的所感、所言和所思；第三，由于人类的文化世界不是



知觉、概念、实践和制度的简单集合体，而是一个依赖于传播并能独立发挥作用的复杂系统，传播的变化将导致整个文化生态的改变。

由此产生了三个与媒介环境学领域相互联系的理论命题。

• 理论命题之一

传播媒介不是中性的。媒介的物质属性结构和符号形式具有规定性的作用，对信息的编码、传输、解码、储存产生影响，对支撑这些传播过程的物质设备也产生影响。

• 理论命题之二

传播媒介有偏向性。思想情感偏向、时空和感知偏向、政治偏向、社会偏向、形而上偏向、内容偏向，由此形成了尼斯特洛姆总结的“媒介偏向”理论。

• 理论命题之三

传播技术对文化产生影响，进而与不同物质的、知觉的、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因素产生因果关系。

这种对技术和媒介的强调，使麦克卢汉以来的媒介环境学者或多或少地带有技术宿命的倾向。英国文化研究学者雷蒙·威廉斯在《电视：科技与文化形式》一书中指出，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忽视控制和使用媒介的机构和人，断言媒介的技术特征决定人们的思考和行为方式，避而不谈社会意图问题。然而这种倾向在媒介环境的另一个主题“语言与文化”的探讨中，却几乎是作为原点被提出的。

面对媒介和技术带来的困惑，多伦多学派的古典媒介环境学者哈弗洛克（Eric Havelock）和英国剑桥大学的人类学家杰克·古迪（Jack Goody）等一批学者选择了语言这一特殊的媒介，追寻它在前技术世界的表现方式及其在社会沟通与认知效果方面所发挥的交流作用。俩人于同年发表的著述《柏拉图导言》和《书写的成果》不约而同地将书写对人类认知发展的一种初步的、偶然的作用归结为古代希腊字母文字的发明和传播，主要的关注点在于字母书写对公元前5到至公元前4世纪的古代希腊启蒙运动所产生的作用和影响。

哈弗洛克通过荷马史诗和柏拉图哲学的比较视野，秉持这样的主张：字母书写对古代希腊启蒙有着重要的甚至是唯一的作用，因而字母书写也奠定了西方文明的基石。按此论见，古代希腊字母的发明使书写的广泛普及成为可能，因而也使得人类意识迅速地、永久性地出现了转型。他还认为，后来印刷术的发明，一方面成为扩大哲学、科学反思的一种工具，另一方面促进了欧洲社会的民主化进程。伊丽莎白·L.埃森斯坦因此重新评价了古登堡的印刷机在欧洲早期的传播与文化转型中的关键作用。

古迪则在《蛮野心智的驯化》（1977）、《书面与口头的交界》（1987）和

《书写传统的威力》(2002)中坚持认为,人类认知的发展与现代理性是“字母书写”的“逻辑成果”。

由于美国和加拿大的学术一直专注于传播模式与认知过程,这一问题的探讨本身也产生了共振。麦克卢汉同时代的学者瓦尔特·翁就公开认同哈弗洛克的论点。在1967年出版的《语词的出现:一些关于文化和宗教历史的绪论》和1982年出版的《口传与书写——词语的技术》两书中,他通过对荷马传统、中世纪僧侣教育、印刷史、电子媒介的性质的探索,认为基于口传(omnity)的思维具有基于记忆的、移情作用的、参与共享的、情境化的、聚合的、保守的等特征;而基于书写的思维则恰恰相反,具有基于记录的、客观中立的、抽象的、分析的、创造性的等特征。

20世纪80年代以后,罗伯特·K.洛根和丹尼斯·施曼特·巴塞瑞特在各自的著述《字母的效果:语音字母对于西方文明发展的影响》(1986)和《书写是如何产生的?》(1996)中延续了翁的研究路线。在翁看来,对语词的研究是人文研究最基本的方式,因为语词使我们成其为人,语言定义并区分了我们的种类。

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口传—书写研究正在向纵深发展,视野也由“口传—书写”的二元对立走向了“口传—书写—电子媒介”的三维观照。受芒福德技术主义研究的影响,波尔特认为我们正处在印刷技术时代的晚期,印刷文本将被电子文本全面取代。佳理·甘蓬特(Gary Gumpert)进一步探讨了由电子媒介统治的社会。

翁及其随后的媒介环境学者认为正在进行的技术化是人类历史上社会与心理转变的基本根源。从口语语词开始,书写词语、印刷语词到电子记录和传送的语词,我们在转换传播方式的同时,也改变了文化和意识模式。他们集中在语言与文化层面的讨论,与芒福德、英尼斯等人偏重技术与文化层面的讨论互为补充,反映了北美媒介环境学者从不同方面对人类传播和交流手段及其技术革新的共享经验做出的普遍回应。

第三节 媒介环境理论的传承

一、伊尼斯的传播理论

(一) 媒介偏向论

伊尼斯的论证从对各种媒介特别是两种类型媒介的分析起步。按照伊尼斯的划分,口头语言、羊皮纸、黏土、石头等属于时间偏向型媒介;莎草纸、文